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

□张冠梓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回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具有深刻内涵和世界意义。

西方现代化道路弊端丛生

数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和技术霸权，一度将西方现代化道路塑造成为唯一的、普世的发展模板。事实上，西方现代化是一条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上、以资本为中心、充满内部矛盾的道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现代化模式固有的、深层次的结构困境日益凸显，在现实中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可持续性危机。

西方现代化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性掠夺和扩张完成原始积累，具有非正义性与排他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指出这种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意味着，西方现代化在起点上就依赖于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夺。这种模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道德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处于所谓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持续地从处于所谓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和剩余价值，使后者沦为西方的附庸。因此，西方国家的发达和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欠发达、经济结构单一和政治动荡为代价的。

西方现代化将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作为核心驱动力，导致人的异化和社会的撕裂。在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准则的体系下，人被当作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而非发展的目的。这种异化导致了普遍的精神空虚、意义丧失和物质主义膨胀，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同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资本所有者高度集中。这种贫富分化不仅侵蚀社会公平，更会引发社会阶层固化、民粹主义兴起、社会信任崩塌等后果，使得社会内部的稳定与凝聚力难以维系，进而动摇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在现实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部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治理效能下降。西方政治制度弊端显现，难以就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议题达成有效共识，使得政府日益丧失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持续下滑。二是经济危机不断。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持续演变。当前，西方经济正出现严重的金融化、虚拟化趋势。资本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不仅加剧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还通过债务、投机等方式进一步掠夺社会财富，加剧实体经济萎缩和产业空心化。三是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愈演愈烈。出于维护金融霸权、控制战略资源的经济动因，以及输出自身制度、维护地缘政治优势的政治图谋，即便在二战结束后，部分西方大国仍频繁对外发动或介入战争。可见，西方现代化并非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其繁荣往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动荡相生相伴，造成了巨大的和平赤字。

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一再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没有现成模板可以套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历史性地承担起了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只能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科学决策、统筹谋划，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推行对外开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一是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二是在战略上不断完善，作出到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三是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近期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重要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乘势而上、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凝聚了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

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突破了人们对现代化原有的刻板印象和程式化认识，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路径。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不但推动了本国发展，还改写了世界现代化范式，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

成功诠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依附性发展”困境，而中国能够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能够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长期稳定。通过制定并坚定执行中长期发展规划，汇聚全国之力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

国注重构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体系建设到如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经济自主性成为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这启示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任何发展模式都必须契合本国实际，经过本国实践的检验。

实现发展目的的矫正。与西方现代化旨在实现资本增殖不同，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规模空前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推进的民生改善工程，都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更促进了社会长期稳定，形成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此外，中国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事求是中取得发展经验。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达成。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过度干预之间摇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表明，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有助于在保持稳定前提下推进发展，这对面临复杂转型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影响世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共建国家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发展挑战，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始终坚持平等相待、合作共赢，这种合作模式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崛起本身也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它以波澜壮阔的成功实践，鼓舞着全球发展中国家勇于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世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凸显。

(来源：《经济日报》)

激活存量资源潜力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孙成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统筹用好各类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是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性认识，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应当处理好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等举措。今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并作出部署，其中包括“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为我们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丰富内涵，以盘活存量资源潜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发展从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是城镇化步入稳定发展期的必然要求。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其城镇化率达到70%后，大都出现因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变化导致低效空间增多、城市活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这些城市普遍停止了大规模土地开发，将发展重点转向城市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例如，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将港区转型为新兴金融商务区、德国汉堡港口新城将老工业区转型为现代化多功能城区，均通过存量更新实现了空间重塑、功能再造、价值再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土地、房屋、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当前，激活存量资源潜力已成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比如，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有的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规模效益，兴建了各类场馆等公益性设施，但由于超越居民实际需求造成利用率低下；有的城市重开发轻运营，投入大量资金到交通、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后期运营、维护及处置环节的预算安排不足，导致运营效率不高；等等。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采取不同方式盘活存量资源，能够提高运营效率、拓宽收入来源、提升资产价值，形成“投资—运营—收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为防范债务风险和带动增量投资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这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引擎的城市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6.7%。随着制造业转型和服务业发展，城市需要对存量资源进行功能调整和布局优化，以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效能。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更加适合高精尖技术和高素质人才集聚的专业化空间，生活性服务业需要能够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先进制造业对产业上中下游集聚度、建筑空间灵活布局、高端人才生活配套设施等方面要求也更高。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将老旧厂房改造为科技孵化器，将传统商圈更新为文旅商业综合体，将闲置楼宇转化为数字化办公集群，在低效工业用地上建设集研发、生产、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园区，等等。这些空间功能的重构不是简单的物理改造，而是产业生态的系统再造。通过要素重组和优化配置，激活存量资源潜力，不仅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既需要顶层设计的科学引领，又依赖地方实践的智慧创造，还离不开市场力量的积极参与。只有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将存量资源的“沉睡价值”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澎湃动力”。近年来，《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指导意见》等出台，为城市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需要看到，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相比，城市发展存量提质增效阶段更加需要多方协同和精细化治理。为此，还需在以下方面持续用力。

一是摸清资产底数，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整合住建、国土、市政等部门信息，同时综合运用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各类资源数据进行精准采集和动态更新，为城市更新规划、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空间调整提供高精度“全景地图”。

二是改造存量房屋，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利用。引入和培育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社区服务等新业态，推动形成运营高效、资金平衡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三是盘活低效用地，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兼顾相关各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优化产权归集、整合、置换和登记政策，化解产业与土地要素的错配，实现空间资源再生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提升。

此外，还要加强基础设施资产管理，通过分类施策与机制创新，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比如，对于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类设施，可通过功能拓展、引入专业机构参与运营等方式提高使用效率；对于公共交通、水电气暖等公益类基础设施，可健全公用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提升资产运营可持续性，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来源：《人民日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哲学意蕴

□邓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包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民族气质，又承载着知行合一的行为品质，还闪耀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识。

一、蕴含“道法自然”民族气质，与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具有高度契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存在高度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并非抽象的理念叠加，而是深植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农耕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始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视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无论是道家倡导的“道法自然”、儒家主张的“仁民爱物”“节用爱人”“民胞物与”，还是佛教秉持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这些思想中蕴含的深刻生态伦理与哲学智慧，不仅定义了中国人思想文化体系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日常实践形态，更为当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并引用《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经典论述，正是对这一传统智慧的当代传承与升华，清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共生性本质，搭建起传统宇宙观与现代发展理念的桥梁。

普遍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在无限时空维度下共有的客观本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联系而存在，世界是万物相联系的系统性整体。这也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人”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的全人类。在西方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严重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导致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遭受恩格斯所言之自然的“报复”，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难以持续的现代化道路。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生

态问题的危害烈度不断升级、影响广度持续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性，解决环境问题离不开全人类的努力。中国提出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庄重倡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中“世界是万物相联系的系统性整体”这一核心思想的生动实践，唯有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将各国的生态实践纳入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框架中，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在普遍联系的辩证关系实现协同发展。

二、承载“知行合一”行为品质，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具有深刻同源性

“知行合一”不仅是王阳明笔下的心学要义，更是中华农耕文明五千年延续的生存逻辑——知行脱节，田地即荒；知行合一，五谷丰登。“知”包含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认知，主张人需以谦逊态度把握自然的内在法则，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行”强调将对自然的认知转化为顺应自然的实践，主张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克制主观妄为，以“顺应”而非“征服”的姿态与自然互动。古人通过观察四季更替、昼夜变化总结出二十四节气、桑基鱼塘、轮作休耕的农业规律，皆是在“知”自然限度后即时展开的“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打破了传统现代化“征服自然、索取自然”的单向逻辑，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思想深度融入生态实践，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价值逻辑，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与实践动力。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一个突出主题和鲜明特征。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

程。”这就告诉我们，实践把人与自然及社会联系起来，人的主体性、人对自然的依赖、自然对人的制约统一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之中，没有实践的介入，就不可能达到“两个和解”，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类只有一方面自觉遵循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在自然规律允许范围内开发、利用自然，才能既生产出一代又一代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精神文化产品，又能为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留存生态环境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总体思路进行整体谋划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三、闪耀“以人为本”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以人为本”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中心地位，不仅关注人的物质需求，更重视自然对人精神世界的滋养，始终将人置于自然生态的整体框架中，既不忽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不弱化工人的主体价值，而是通过“顺天应人、可持续发展、精神滋养”的路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思想不仅为古代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更为当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只有始终以人的生存福祉、发展权利与精神需求为根本，才能在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人因自然而生”，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一旦生态遭到破坏，人的生命健康与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把握这一逻辑，将“守护生态底线”作为满

足人生生存需求的核心任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二律背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受资本与利益驱动，人类对自然展开前所未有的开发，虽获取大量物质财富，表面成为自然的主人与征服者；另一方面，过度开采使自然承载力逼近极限，加之大工业发展与污染加剧，人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反而逐渐沦为自然的奴隶与被征服者。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和解”，以此来破解人类社会难题、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然而“两个和解”不能自动实现，只能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中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原则，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逻辑，也彰显了东方大国现代化的生态底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擘画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蓝图，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生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两个和解”在中国的实现明确了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

【作者：邓倩，桂林医科大学副教授。本文系2021年度桂林医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21ZXZD01）、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发展轨迹研究”（2023KY0499）、202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年度课题“新质生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25KSF261）成果】